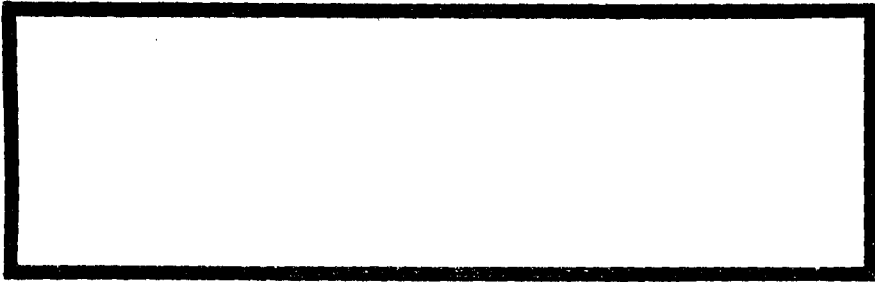


编号_____



()

编印单位_____

材料时间_____年____月____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军事资料室

一九七 年 月 日

建军报告初稿

大会主席团和全体代表同志们

时间过得很快。从我党六大到七大，转眼已经17年了。这17年间，我党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革命事变，全部过程均以政治军事斗争为骨干，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的志士人士，均为着民族和民主事业，作了断头流血碎骨粉身的伟大牺牲，先烈们伟大牺牲的代价，便是今天期在不远的中国人民的抗战和民主的新胜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去全面的完成这个新胜利；以告慰先烈于地下，以奠定人民大众自己所争取的福利。毛泽东同志对大会的政治报告，全面概括了这十多年来时的斗争过程，同时很正确指出今后的斗争方向，我相信这些指示，必然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因而这些指示，也更确然对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以及战后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新贡献。我现在除完全同意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外，还想就军事问题，作一些探讨和引伸，我希望我这种尝试能引起大会注意，並作为决议的参考。

（一）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

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族侵略和国内暴政的英勇事迹，充满着中国全部历史。在反对外族侵略上，腐败无能的国内统治者，不是妥协投降便是南渡偏安，而在淪陷区坚持民族反抗的，只有人民大众。更重要的是国内统治阶级，每每不扶助敌后的正义反抗，相反的协同外族予以摧残，这样便历次构成华夏灭亡，和异族主政的痛史，我们只略举辽金元清诸史实；其中河北义士，中原豪杰的屡代的抗敌行为，其发轫和归宿，便可作为痛心的例证。在反抗国内暴政上，则自周秦以来，迄近代；每一朝代的改换，莫不以人民大众的武装反抗为发动因素。农民暴动的反复，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进化

的原动力，其斗争形式是农民革命战争，其战略战术，是在广大地域上，进行长期游击战争，其力量构成，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干，吸收了各阶层人士参加活动，其基本政策是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切身要求，解救倒悬，出诸水火，常常着手土地制度的改革等。这样便能够成就伟大的革政鼎新的革命规模；一面是打击了旧的封建统治、一面是或多或少变动了旧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要指出其成就和改革的方面，不免迟缓，甚至于呈现出某种反复的现象，这是由于受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出现的原故，由今视者，这是一个不足为病的弱点。直到近世纪开端，才完全发现了。国内外的历史家，每每把中国社会的这种历史现象，规定为中国历史的长期停滞性，认为不能索解，其实乃是一个大的谬误。因为每一朝代的历史学者，都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其秉笔赞扬的不外是，诸侯之门仁义存，而专事污涂人民大众的正义反抗行动，因而几千年来，每一次改革的进步性，和人民群众前进功绩，便全部被改篡和抹煞了，人们自己在迷网中，不去发掘真理，继存前修那是自己错误，历史事实是不负责任的。

代表同志们，我不想回到故纸堆中加入学究一群去进行斤斤的争辩。我只想指出这种抹煞中国人民大众的伟大功绩是一个罪过，我们提出对中国人民武装斗争的传统作重新的估价，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看着中国统治者腐败无能以为三个月内可以灭亡中国，满以为北陷平津、南取沪宁、进占黄河长江，即可以造成钗金元清的旧局，他连梦也没有想到敌后的坚强的抗日游击战争之出现，例如在华北、华中、华南业已创立起的敌后解放区，以巍然独立的姿态，抗击敌寇，8年于兹，日日趋强大成为战胜日寇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中国人民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再现。更由于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把中国人民武装斗争，在历史上的弱点，加以补足，他是以全新面貌，钢铁姿态，来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完全出乎日寇的意料。这个伟大事业，开端已久，距收获的季节，已经不远了。我很欣幸站在大会的讲坛上，指出我党今天是善于掌握历史，能根据新的战争条件继承中华民族的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而且能够加以新的发挥，这是我党不负前贤，启发后昆的无尚的民族光荣。

（二）我党建军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

我们党为什么要建立军队呢？我回答是完全基于中国人民的需要。请回想1926到1927年，这一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过程，首先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投入反动营垒，煽惑曾参加过革命的国民革命军队，掉头镇压人民，这些军队虽然参加过北伐战争而其本身成份、制度、习惯、仍保持着军阀军队雇佣性的旧型，故迅速由革命方面转到反革命方面，成为屠杀人民的工具。当着彼时大革命失败之际，中国革命人民惨遭屠杀的悲惨情景，逼迫着我党为了保护人民和挽救大革命，不得不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自卫。这种武装自卫的尝试，便是我党独立建军的根源。假如当时我党不独立去拿起武装，则人民之被屠杀压迫，将无止境。中国大革命的传统，将被腰斩，必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更顺利协同国内反动派来宰割中国人民的机会。就是10年之后，1937年的七七抗战能否暴发尚属疑问，我们是可以从推想中得到的。这一段举行革命自卫而建军的历史，只是中国人民武装自卫的神圣权利之正当取得。国内反动派，多年不断对我党这一革命行动进行指责，诸如《暴徒行为，暴民专政，武装割据，叛军奸军》等诬蔑咒骂，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要求我党主张中国人民俯首贴耳，听从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是永远做不到的。

那吗，我党被迫建军，又是建立的那一种军队呢？因为我党所以处的被压迫的在野的地位，故不可能采取一如西欧各国国家式的建军规模。因为中国革命的艰苦性，从分散的农村作为革命起点，故不可能采取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中国封建式的集队方式，我们的建军是走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武装斗争的光明的建军大道；由人民的武装反抗转到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再进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正规军团之出现，因此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道地集体创作，所共同培养出的一支革命鲜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数农村集合成强大的根据地，再发展到全国，出现于抗日战场。这一支军队，离开人民，不能存在，人民离开这支军队，也同样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为人民服务、建立与人民的鱼水关系；这是这支军队从呱呱落地直到今天的根本属性。因此，建立一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军队，是我党建军的根本目的，这支军队的名字便是今天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表现出他本身的民族性和民主性的双重特点。在抗日民族战争中，他不象某些军队退却、逃跑或叛国投敌。他八年来能在敌后忍受无比艰苦，胜利执行对抗敌寇的任务，不仅未出一个投敌的军官，也未出过一个投敌的士兵，这种民族气概的伟大表现又正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我们看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投敌总数，达80万以上，两相比较便不难了解这些投敌军队不单单由于上层军官的不肖的缘故，而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的雇佣制度是靠个人作用，来维系的缘故。另外，假如全国人民切身感受着不守军纪，摧残人民，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现象，而八路军新四军则表现与人民合作的亲切关系很自然流露，这中间的区别在于八路军新四军多年来均是献身争取民主斗争的战士，而不

是摧残民主的工具，这也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贯坚持和厉行为为人民服务这一铁则。故能在中国民族与民主双重事业中经历锻炼。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而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八路军新四军之不愧为民族先锋和民主战士，便被中国的历史事实所确定了。

我再就八路军新四军的本身工作，来证明上述的分析。通常观点：军队是以打仗进行军事业务唯一工作，其他事项军队是不理会的。然而自成立之日起八路军新四军，既于打仗的军事任务之外，还得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群众动员工作，还得从事经济生产解决自己的供给装备诸种工作，军事、政治、生产三大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常工作对象。这样的军队不能不是突破历史的古今稀有的新型军队。入伍为兵，退伍为民。来自生产，回到生产。变军营为学校，变破坏为建设，军队放在人民之中，不放在人民之上，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于是中国旧军队脱离群众一切恶习，便是一扫而空，华北华中敌后人民推称《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团》。这正是根据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在长期体验中，发现本质的论断，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共产党与这支军队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我的回答，十多年来，这支军队均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进行活动。这支军队是在我党抚育之下长大起来，他与我党有《不可须臾离也》的密切关系。党与军队这种关系，国内曾有人致非难之词，提出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番研究，我首先认为人们鉴于国民党军队，业已变成个人专政独裁的工具，因此要求改变党军的办法，这是有根据的，正可以提供国民党方面作深刻反省，但如果这种片面主张，把他一般化，则其害不可胜言，我认为世界有两种党军：一种是希特勒式的党

军 一种是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希特勒式的党军，是建筑在愚昧
欺罔，对领袖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在消灭民主，征服世界。
这种党军，不得不变成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种党军，不仅
应该深恶痛绝，而且应予以彻底消灭，这是世界公论，已成为全世界
将要完成的共同事业了！另一种如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他以服务
人民争取中国民主争取世界和平为目的，是人民的救星，只嫌其少，
不嫌其多。对这种军队，采取取消主义或不承认态度，乃是根本反对
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反对中国民主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这是要请
朋友们加以深刻考察的。与其朋友们关心党军的称号和制度，不如进
一步考察某一党派及其统帅的军队的具体内容，他们是专为私利，不
惜使用军队来殃民祸国呢？他们或是多年来半随军队作自我牺牲专替
国家人民服务呢？只有这种具体的严格检查可以得到法定的正确标准例如北伐
初期，清党以前的国民革命军难道因其有党的色彩，便可以否认其革命功绩
而加以取消吗？例如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的军队，敢于向人民开枪，
敢于俯首让敌，敢于屠杀青年，这样军队难道因其无党军称号，而你们
便主张给予保留吗？我们应该站在军队人民化和个人化两者之间，
选择其一。党的地位，只看他率领军队，是站在为人民服务一边，或
者站在替个人专政服务一边，只有这样去决定其对党与军队的态度，
才是正确的。国家化这一口号，如果从为人民服务出发，而那个国家
全部是民主化的人民有权的国家，那这个口号便是正确的，如果国家
化这个口号，不是从服务人民出发，而那个国家，正处在寡头专政的
状态那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他正帮助野心家长期掌握军队作个人祸
国殃民的工具。处在中国长期不民主的状态中，人民痛苦深重，外有
敌寇入据国土，内有贪污高压横行，正需要有主义有领导为人民服务

的如八路军新四军式的党军，来担负民族与民主双重任务。象这样的人民革命军队，只有在人民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造成，也只有这样服务人民的军队才真正是国家化的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应该看他是否服务人民，而不应该看他外面所贴的商标。因此八路军新四军这样替人民服务的军队，是应该奖励帮助，使其扩大，而不是抵毁他，限制他，或者企图取消他，我愿以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代表资格请求全国人民，来检查八路军新四军的实际，我更愿以党派我多年担负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者的资格，要求七次大会使用大会权力来检查八路军新四军的实际。看他是否违背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建军最高原则。为了严视真理和事实，全国人民和七次大会必然会批准我对军队的这种严肃态度，我更希望全国友军将士也同样采取这种严格批判自己的严肃态度。来检查你们所率领的军队，使你们军队，也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请不要犹心，这里不会泄露什么军事秘密，军事秘密是对敌寇而言，要做到一丝不漏，对中华民国的主人公，老百姓们，他们是军队的衣食父母，应该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有检查军队的政治本质的权利。

从六大到七大这17年中间，创造成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光荣的革命铁军，这是此时期内我党的第一等重要工作，第一个伟大的成就，我党拥有这支军队是我党的无上光荣。这支军队得着党的培养同样是这支军队的光荣。党与军队结合坚决为人民服务，广大人民给予党和军队的援助，造成军民的伟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战胜和必然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源。这也就是我中华民族人民全体的无上光荣。我还得指出从党创造军队这一伟大工程中，不可忘记一个名字，那就是毛泽东同志。记得在我党建军的每一阶段上，无论

在统论纲领上、无论在绪论条目工夫上，件件般般皆可发现毛泽东同志神不斧凿的痕迹。当这支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有毛泽东同志在一道为之决策，为之指示方向，在如何力戒骄傲，如何保持胜利发展胜利，可是当着这支军队遭着空前失败的时候，仍然有毛泽东同志在一道同生死共患难，靠他掌舵，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重新进入康庄大道。党与军队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存在着血肉的联系，我以多年与毛泽东同志共事的战友身份，多年统带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份，以切身经验证明，我们的军队不能离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我们更将高举毛泽东旗帜英勇前进。

（三）论创造军队

我党是何时了解军队的重要性呢？並在何时开始军事工作呢？还在我党成立之初，在1923年党报响导周刊上，即有论文，指出建立新的国民军以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论断，又不断有关于改造旧军队进行士兵革命工作的号召。1924年间派大批党员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另外又派叶挺将军率领一批党员在肇庆成立第四军独立团军校工作与独立团工作均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占有历史地位，无论在创造干部上，影响国民革命军制度上，提高战略战术上，建立军队政治上，皆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我党对国民革命的重大贡献一面，然而这仍然只能说党在当时是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仍是不完全的。

由于党在建立之初，由马克思主义小组正转入群众性政党的新的政治活动时期，党的课程是急于放在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方面，尚来不及以全力进行军事活动。同时，党内有一种意见占主要统治地位，即对中国革命看法纯全采取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看法，企图以片面的民众

运动。去完成国民革命，根本否认争取军队的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重大特点是熟视无睹的。这个错误，一直继续到1925年到27年大革命之末，其危害是很大的，具体表现在不用大力作争取军队工作，即在部分军事工作上，只愿党员任政治工作，不愿党员任军事指挥工作，在军队中一切迁就同盟者的意旨，失掉革命立场，不愿自居于对军队的领导地位，而自甘退居辅助的地位，虽然在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由于我党的政治工作起了伟大的团结军民的革命作用，然而野心家们利用了军队指挥权不在我党掌握中的弱点，遂能顺利指挥军队进行反革命政变，这个教训，是不能不牢牢紧记的。这是我党对军事工作初期的情形，这是陈独秀机会主义不要军队，违背人民利益，送葬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然而大革命的失败教训，造成我党以后伟大的进步。

1927年冬大革命失败，使我党进入独立建军掌握武装的新时期。

此时期情况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革命人民遭受屠杀，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已变质成为军阀屠杀人民的工具，空前的白色恐怖，遍于全国，全国人民，特别是大革命影响深入的省区，如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等地所遭受的惨杀，无可忍受，我党不得已才领导革命人民，退出城市，依据农村，举行武装自卫。这是一面，另一面在国民革命军有一部分不愿意叛变革命的军队，在我党领导下，举行革命起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如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另外如秋收暴动，均有军队掉头站在人民方面跑来参加，因此大革命虽失败，但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的武装自卫，得有正式军队的参加便更强有力的发动起来了，因此不要忘记工、农、兵、革命知识青年的大联合，便是我党建军的

基础。

这种工农兵武装自卫的大起义，造成全新的革命局面，党不仅了解创造军队的必要，而且必须独立担负这个任务，更必须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以区别于国民党的旧式军队，党研究了大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教训：一面保留国民革命军中的优良部分，一面抛弃其中的恶劣部分。党必须以健全的军事方针，始能应付当前局势所提出的新课题。这中间最能领会大革命教训继往开来的首推毛泽东同志，这不是偶然的，在政治方面，在党最初决定国共合作的时候，以及党的五次大会紧急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明定友我阶级界限的主张，以及以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的主张这些正确的远见，并未得着全党的公认，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村，首先毅然着手政治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新创造，当时平浏各地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以及由武昌出发转到人民方面的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举行秋收暴动，这个暴动失败后，不久与南昌暴动军的余部（肇庆独立团后身为其中骨干配合湘南暴动农民）会合于湘赣边界井冈山，配合当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规模和力量便逐渐强大起来了。

历历如在目前，我记得1928年春到1929年12月闽西古田会议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经常报告党和指示我们，是针对着以下的问题，坚持下列诸原则：

第一、我们必须废除旧军队长期脱离生产、脱离人民、因而养成的雇佣性质，这是一切军官得以利用军队进行祸国殃民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废除旧军队的雇佣性质以创造能为人民谋利益的新军队，这是我党建军的基本精神。

第二、必须吸收革命的工人农民加入军队，作军队成份的改造。另一方面必须着手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并且在分散打游击和作群众工作中使官兵与人民接近，共同作革命工作，这样去改造军队的气质这里就提出和建立了在军队中的群众工作路线，这里就解决了军民团结和合作问题。

第三、在解决官兵关系上，提高革命服从，官兵平等废除肉刑废除打骂，不枪毙逃兵等民主制度。这定对于军阀军队定型的压迫制度的大胆的根本破坏，使官兵双方在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目的之下亲密团结起来。

第四、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确定军人服从政治的领导，军队是推行政治的工具的根本原则，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必须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去推行，这里就提出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问题，消除了党权与军权的对立问题，造成党与军队的不能分离。

第五、军队下层的广大士兵，是一个武装的群众问题，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党员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军官党员和士兵党员，都是拿出一般党员在工人农民群众中的工作精神，在部队进行工作，党员不是以特殊的资格站在士兵之上进行工作，而是以士兵资格逐处代表士兵的利益，领导士兵走自由民主维护部队的革命斗争大道，同样在军队各级，设立政治机关和各级政委，这是由上而下的政治领导和动员工作，与党员在士兵中间，由下而上的政治工作互相结合，造成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便保证了军队能完全负责去执行党的政治和军事的战斗任务，完全忠实于人民事业，使军队成为为人民服务工具，而旧军阀把军队当着个人工具的事，在我军中便完全消灭了。

第六、在战略战术上进行崭新的改革，一面是保存了国民革命北

伐时代大胆挺进英勇冲锋的突击战术，一面根据敌我强弱悬殊和农村分散环境，提出了经过百战磨练的游击战术，我可引用1929年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前交给中央的信上面说：

我们3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一天的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是毛泽东同志概括我军最初战斗经验作出的总结，我得指出旧的军事头脑，不会懂得这种战术的，是不敢作如此大胆分散的，是反对用军队去发动群众的。旧军队战术一般指示了进攻与退却的原则，然而把进攻与退却综合研究，特别提出弱小军队在强大敌人面前，敢于大胆退却再转到大胆进攻，这又是中国旧军事学中找不到的。根据地思想之提出，以及凭险依山的巩固发展方针，以及长征时的摆脱战术，这些新的创造反映了红军在强大敌人围剿跟追时代的艰苦，更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在当时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伟大的革命军事天才，我们在尔后的多年国内战争中，以及当前的八年抗战中，还可以看见上述的战术原则的创导和启蒙的功用。

第七、建立了团结人民群众的纪律制度。旧军队只有军纪风纪，军纪所以强迫士兵服从军官，风纪所以重军队内外的胆观，对人民养成军队的威严。至于涉及军民关系则不属于条令的范围，反之旧军队逐处有

派兵治民的事实，我军军纪着重自觉服从，所谓连坐法于我军毫无用处，我军风纪，不在形式，而在于民主自由的活泼精神。群众纪律便是我党的新创造，他正确解决了军民关系，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养成军队官兵与群众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一碗一筷之微，必须不可侵犯，就是把我军官兵英勇牺牲献身人民事业的精神，表现于日常与人民共处的关系之中。这种群众纪律制度便成为军民结合的桥梁。

第八、建立优待俘虏的制度，这是证明本军代表工农兵的人民利益，包括对方被压迫的官兵在内。因此本军敢于从优待俘虏转到武装敌方归顺的官兵加入共同作战，只有忠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我军，才能有此气魄。这个政策在战争中收得瓦解敌方意志的伟大效果。

第九、我军开始即估计到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故即注意到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这样建立废除苛捐，战时自给的供给制度，至于由此出发发展到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则是以后的事了。

第十、更其重要的是创造根据地的重要性之了解，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路线是从工人运动到城市起义，第二天取得政权，则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于经过工农运动，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中国马列主义提出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融汇了中国汉唐以来的历史和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所发现出的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因此创造根据地，坚持根据地，爱护根据地，发展根据地，便成为党与人民大众的根本革命思想，这个思想的创导是毛泽东同志由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其正确性。

以上是我军最初建军的纲领，一般包括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的讨论和决议之中，把中国社会上军民对立、官兵对立、党政军

对立的腐恶痕迹便彻底肃清了。这样明确规定了党政军民的关系，用党以建军再利用军队发动民众扩大地区。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同时掉过来党与政府和人民又用全力来帮助军队，这里明确的使党与人民认识了中国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间的杠杆作用，这些关系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和结论是在开展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的艰苦过程中所获得的。党一方面必须接受国民党暴动军的遗产利用其军队经验，一方面必须改造其雇佣军队脱离群众的本质。党一方面必须起用和信任旧军队出身的军官，没有他们，当时我军的作战指挥，不是一般民运党员所能胜任的，所有一批旧军官、在这点上，均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党一方面，必须用力对他们进行改造，党不顾情面暴露了投身革命的旧军官，与我们党中间的矛盾。是否从群众出发，是否具有群众观点，是否承认农民战争是我军的革命特质。便是争论中心问题，现在看来，假如党当时不坚决克服出身旧军官的党员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他们的以军治党以军治政以军治民的错误观点，那是会破坏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党在这方面的思想上的胜利于最初建军有其决定意义。党一方面利用旧军队。欢迎旧军队官兵转到革命方面来。党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队，不从内部瓦解，将增加中国革命成功的极大困难，因此必须与党内不重视军队工作。无条件排斥旧军队的倾向进行斗争。党一方面，反对军队中不愿建立根据地，不重视根据地的革命流寇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方面反对地方上不顾全军队主力。要求无条件死守某一根据地的地方主义。党的正确原则是承认红军主力必要时的转移。同时必须部署加强地方武装以达到主力转移后可能程度的坚持根据地。因此只注意扩大主力不帮助地方武装，和只注意武装地方不帮助主力，两者都是错误的，党在时局估计上，一方面反对空洞乐观主义，不了解斗

争长期性，幻想冒进明天就取得胜利，一方面反对悲观失望情绪而怀疑红军苏维埃之能否存在，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正是这种胜利时轻敌冒进，失败时悲观失望的代表，1928年秋进军湘南的失败，便立即受着历史的惩罚。党的主张，是艰苦作群众工作，艰苦作游击战争，从深入土地革命去扩大红军去扩大根据地，去迎接和发动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这是党在当时从群众利益出发，从正确估计政局出发，从反对各种偏向出发。特别是反对旧军官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急性病两种偏向所以能够在反革命的长期围困中达成建立红军发展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从秋收暴动、南昌暴动、井冈山斗争，直到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区联系，建立中央苏区为止建军规模确立的过程。1929年12月，闽西古田会议便全部总结了这一时代的经验教训。便在政策上，组织规模上，完全奠定了我军历史的建军基础。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路线的纲领，便以完备的姿态出现了，这一伟大的创造功绩应归功于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创造精神，其超脱人寰处，在于就当时的每一革命经验、每一农村材料、每一具体事物，作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把马列主义的原则，放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上加工。这种结合便创造出新的原则，再去指导革命实际，从而得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又进一步使中国革命的理论丰富起来。这样使我们在斗争中便受用不尽了。毛泽东同志熟练的手，是在什么树上开什么花，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农村，却不研究农村，脚踏实地从发展农村出发，而天天幻想城市，把城市工作方法强迫移用于农村环境，反对了一部分同志立脚中国。却不研究中国社会情形，一切不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机械把外国革命规模移用于中国环境，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人民的智慧，变成共产党的智慧结合创造出新的智慧。因此毛泽东同志成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智慧的最优秀的代表。这一身份在早年便确定了。当时有不少的人，嘲笑毛泽东同志为右倾，为保守主义为农民意识，今天历史出来作结论，被嘲笑乃是那些嘲笑人自己而绝对正确的，代表中国马列主义政统的，乃是毛泽东同志。

1928年党的六大大会决议中，指出《中国革命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意义》又指出《建立苏区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规军队，巩固军队中党的领导》这些指示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是很正确的，然而由于斗争的环境限制，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最初建军经验，不可能即时反映到六大大会中去，但六大大会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性质，指出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建立苏区和红军的任务。这些正确指示对各地启示非常之大，我记得1928年冬，六大决议到井冈山，在我们研究中，即指出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反对盲动主义，以及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革命根据地办法，是与六大决议符合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超过全党的独特的卓见，且较六大决议更其前进突出，更其符合实际故能别开生面，更其深入具体的发展了我们工农兵的革命事业。

在这一时期的建军，我是以江西福建湖南三地的红军斗争经验为中心来论述的。同时在鄂豫皖木兰山，在赣东北磨盘山，在湘西洪湖，在广西左右江，在广东海陆丰等地，红军发展过程，虽各有特点，但一般的均走着相同的路线，举一反三，我不一一复述，我要特别指出的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中国的首创，但以后在发展红军的过程中，由于盲动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各种环境的限制，宣告了失败。这是